

独特的浩然现象与 中国当代文学

刘晓红 著

独特的浩然现象与 中国当代文学

刘晓红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特的浩然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学/刘晓红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1. 5

ISBN 978 - 7 - 80752 - 789 - 3

I. 独… II. ①刘… III. ①浩然 (1932 ~ 2008) —文学
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3132 号

独特的浩然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学

刘晓红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1)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 张 7

字 数 2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2 - 789 - 3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

李 怡

刘晓红博士是王富仁老师在四川大学招收的第一位学生，她的论著要出版了，按理应该由王老师亲自撰写序言，不巧的是王老师身体欠安，嘱我代笔，我就只好接受这一任务了。关于浩然的研究，我几乎谈不上更多能够超越本书的观点，只能就整个十七年的研究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十七年文学在最近一些年逐渐成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约包含这样一些因素：历史“否定之否定”演进中的心理补偿；“现代性”反思的推动；“新左派”思维的影响；新的文学文献的发掘和使用。在今天，有必要对这样一些因素展开认真的分析，因为只有通过分析，我们才能更自觉地检讨我们的学术语境，从而为研究的健康发展提出新的创造性的方向。

首先，十七年文学研究“热”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心理补偿效应。众所周知，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而重新质疑“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方向上发展自己的。随着新时期文学主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演进，“文化大革命”以及十七年文学政治偏激、艺术苍白等特征越来越多地被“揭露”、被“批评”、被“超越”，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封闭保守的艺术佐证几乎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反面教材”。更重要的语境则来自当时社会改革的总体情势：新时期的历史从“联产承包”开始

大规模地偏离了十七年“合作化”的道路，作为被否定的历史的文学记录实在相当的尴尬。于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狂飙突进，十七年文学逐渐进入了它的“寒冷期”，越来越少于进入人们研究的视线。

然而，历史的演进从来也不是沿着某一固定的思想立场不断展开，任何一个立场也都不可能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所有问题，甚至还可能萌生出新的、更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回旋、往复，人们也时常会在这些回旋、往复的间隙重新回味自己的失落，并且试图给自己某种“补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问题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逐渐成为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就在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我们回首往事，不禁也会为十七年时期中国人的简单和朴素而感动，在那个物质贫困的时代，人们似乎并没有更加不幸和怨天尤人，相反，以一种特殊的乐观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也以一种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维护着社会的理想，这其中的动人之处显然是不容抹杀的。

与此同时，关于“文学”的认知似乎也有可能出现新的方向：新时期以来，我们不断呼唤和倡导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持续不绝的“新潮”，是文学不间断的自我突破和创新，是一个接一个的“方法”，一时间，似乎只要掌握了最“新潮”、最“时髦”的写作方式就掌握了未来。谁最终掌握了未来呢？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看来，当属“后现代主义”无疑！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们已经能够最及时地“引进”西方的“最新”文学思潮之后却反而失落了，茫然了：后现代之后又该是什么？难道我们永远只能做一条追逐自己尾巴“创新”的小狗？在连续不断的追逐疲惫之后，我们应该思考的更深的问题是：文学，除了“写什么”与“怎么写”，是不是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比如“写得怎么

样?”在这个新的思维下,也许我们会重新“发现”十七年文学——它自然有无法摆脱的“左”的宿命,包括“写什么”与“怎么写”,但是,除此而外,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会承认,在我们艺术记忆的深处,尚无法轻易抹除那个时代的许多文学印记,包括柳青,也包括浩然,在这里,“写得怎么样”似乎是一个回避不开的话题,如果直到今天,在目睹了新时期文学中新奇的艺术变换之后,我们尚不能忘怀十七年文学的某些影像,那么,其中值得我们回味和再评价的部分就不容小视了^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在今天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当的热门,反映出的是人们对近30年来文学发展某些状况的不满,是其自我心理补偿的需要。

在这一心理补偿的过程中,出现于学术界的“现代性反思”显然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是在全社会的“现代化”理想中高歌猛进的。现代化的社会目标与文学目标一样的不容置疑,在中国文学历史的讲述中,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奋斗就是为了现代化目标而开拓前进,这是我们弥足珍贵的历史,也是我们将要接续的传统,十七年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危害的最可怕的后果便是中断甚至破坏了这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时期号称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力图要回归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主题,在回返“五四”现代化启蒙的方向上,新时期文学努力着。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理想的批判和质疑,也严重地干扰了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理想。

①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7年3期。

按照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逻辑，现代性是西方在自己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社会文化理想和价值标准，后来又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向东方“输入”，而“后发达”的东方国家虽然没有完全被西方所殖民，却无一例外地将这一套价值观念当作了自己的追求，可谓是“被现代”了，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被置于一个“文化殖民”的过程中。显然，这样的判断是相当严厉的，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精神大旗，不得不重新定位我们的文化理想。

就是在质疑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性反思”中，我们开始重新寻觅自己的精神传统，而在百年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中，能够清理出来的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理念的传统也就是十七年文学了，于是，在反思西方现代性追求的目标下，十七年文学的精神魅力又似乎多了一层。

20世纪9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新左派”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我们对十七年精神文化传统的挖掘。与一般的“现代性反思”理论不同，新“左”派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理想本身，只不过它更突出了自十七年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的独特性——一种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换句话说，十七年中国文学包含了许多属于中国现代精神探索的独特元素，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梳理。总之，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这个时代的文学以“封建”、“保守”、“落后”、“僵化”等等唾弃之显然就太过简单了。

如果说前述三个方面的力量都推动着我们对历史的新的评价，而且更倾向于肯定性的再发现，那么，十七年文学问题的讨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表现，那就是随着一系列新的历史材料的发现，也有进一步反思“左”倾错误、透视知识分子灵魂的要求上升。这些新的材料包括一些公开的运动揭发材料，包括一些中国作家并不愿意公开的“紧跟形势”的言论。随着这些文献的发现和解读，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中国知

识分子命运和人格的深入思考，当然，这样的思考往往带有某种“压迫性”——对当今文坛本身的压迫性。

种种因素共同造就了这样一个局面：多年的沉寂之后，十七年文学重新引起了学术界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尽管这些关注的实际理由未必完全相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关注都是文学史的大幸，因为，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学人在不同的层面上将一段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肯定将为我们的未来贡献许多有益的结论。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另外一个问题，即形成学术的热点是一回事，我们能否在这样的热闹中真正推动对历史内核的深入认识可能又是一回事，毕竟，在一个网络化、媒体化的时代，我们从来都不缺乏热点，但并不是所有的热闹都能够引导人们平静地深入历史，因为热闹而让历史在嬉戏中变得无足轻重的事例已经太多太多了。

因此，在介入十七年文学研究热之前，我依然想奉献几句不够“时尚”、不够“和谐”的建议：在以上这些理由能够吸引我们之前，首先需要追问我们自己，关于十七年的文学，我们究竟有多么丰富和尽可能完整的感受？因为，结论的时尚并不能够替代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把握，时尚是一时的，而感受是一世的。比如，当我们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步伐来反思和批判现代理想的时候，是否有更充足的理由认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完全是由殖民者的文化来划定的，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求索都缺乏真诚和足够的现实基础？还有，“左”倾年代的“反修防修”和唯阶级斗争论是否能够导致“现代化”的实现？如果这些的逻辑本身也值得怀疑，那么我们就更应该追问我们的内心：在真诚感受十七年的文学之后，我们是否真愿意倾情拥抱？一种割断了“五四”启蒙传统的朴素真正能够在多大的意义上成为我们的信仰资源？

当然，这也不是说另外一方面的反省就没有问题了。在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无情的“拷问”，从现代中国文化的实际状况而言，这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整个文化格局都发生了严重问题的时候，对历史的反省是否都可以交付给别人的“人格”来加以解释？比如对郭沫若人格的讨论。似乎郭沫若的人格成了当时中国文学问题的主要根源，显然，无论就历史的事实还是基本的文化逻辑而言，这都是很可质疑的。这也激发我们去思考：新的批判性反思能否跳出揭密/暴露的模式，最终推动我们的思考上升到一个新的理性的层面？

而一切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则应该是回到文本，坚定不移地回到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当中。正如刘纳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在认真追问文学作品“写得怎样”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讨论历史的组成和它的未来。

刘晓红博士的论著就是以对浩然的文本阅读为根据，因此显得比较扎实可靠。这样的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值得我们充分肯定。这样的研究方式，也是刘博士师从王富仁老师学习的结果，是王富仁老师给予我们的学术启示。我想，这样的理路在当今还需要进一步发扬和推进。

是为序。

引 言

一

浩然作为跨越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时期的见证作家，他在每个生命阶段的创作都预示着当代文学的转折性意义，他在文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说清楚浩然，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可以在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初期三个时代的文学转折点上，勾连众多具有意义的文学现象。而现实是，虽然目前评论界重新开始关注浩然，然而在肯定与否定，在众多新思路、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中，尚未出现说清楚浩然问题的研究结果。这说明，浩然，一个看似简单的个案，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学激素，它可以映射出整个当代文学历程，要说清楚浩然，就要搞清楚整个当代文学，换句话说，说清楚了一点点浩然的问题，就能加深一点点对当代文学的理解。

目前，文学界开始再次关注浩然。他就像一个辉煌之后陨落的星星，在多年隐忍、坚持创作直到生命结束之时，又一次掀起文坛的风波。相同的是，他一直固执地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同的是，他在平静却有几分委屈的情绪下，注视人们对他的褒贬。令人惊奇的是，经历极“左”时代的政治话语，被西方文艺理论搅动、翻新后的今天，有些学者对浩然

的评价仍有停留在整套政治性话语阐释的嫌疑中，甚至直接发起对作家本人的人格攻击，激动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能代替文学研究。而在试图为浩然辩白的大部分文章中，除了对其人品的赞誉外，学术研究成果均未超过1987年雷达的一篇《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反观浩然的创作道路》所做的论断，当然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李云雷、李洁非、孙达佑、贺桂梅、段怀清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浩然研究进行推进。整体来说，不管使用何种方法、站在什么角度，尊重作者的心灵产物——文学作品，才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点。在大量充斥着批评的论断中，很少有人是完整阅读作家作品而确立论说的。无论怀揣什么态度对浩然进行论述，阅读作品是第一步。文学研究是对文本的文学性研究，我们不能过分地用政治、经济、宗教等外在体系代替文学感受，因此在研究浩然文学的时候，最关键的是体味个人的阅读感受，体味作品什么地方打动了人，什么地方带给人独特感受，这才是文学研究。

浩然的是是非非，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清的。理解浩然，是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小说的有效渠道。浩然终其一生说他要“为农民，写农民”，无论从生活还是创作而言，浩然都做到了言行一致。他长期生活在远离繁华都市——北京的河北农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充满热爱，对农民朋友饱含感情。他四十五年的创作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农村题材小说，对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新时期每个阶段的农民形象都有书写。农民生活、农民思想、农民故事日夜与他相伴，成为他创作人生的唯一主角。对于这样一位“写农民”的作家，他的心血却事与愿违，从最初创作的清新的、带着露珠的十七年农民新人形象到红遍天下的《艳阳天》里的农民英雄形象，再到集大成的《金光大道》中的农民阶级典范形象，浩然的文学成就随着他创立的文学形象步步高展，但

同时，时过境迁，从“文化大革命”后到如今，人们依然对其创作的农民文学形象抱有“真实与否”的争议。在浩然据理力争自己的创作是真诚的，自己书写的农民是真实的，笔下农民的故事、情感是真实的时候，“真实”成为关注十七年文学以及浩然创作的一个关键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等等文学术语随之接踵而至，这些都是当代文学越来越模糊不清的文学术语，它们对浩然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梳理这些概念和概念的真实情况，是两益的事情。回到历史现场、小说文本，我们如何考证浩然的农民形象是否真实？是否该用历史的真实来衡量文学的真实？浩然给我们提供的农民文学形象有没有意义，意义何在？我们又该如何来定位这些意义？这些都是问题的关键。浩然笔下的农民无疑是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文学形象，他们承载着激素般的意义，探究他们的意义，就可以启发对农村合作化小说意义的评定，进而推进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放眼整个新文学农民形象，从阿Q到祥林嫂、翠翠、老通宝、朱老忠、梁三老汉、梁生宝、萧长春、陈奂生、孙少平、田大妈、田保根……浩然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农民形象？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之独特性何在？正如赵园在《地之子》中认为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农民与文化史意义上的农民，都属于“知识者”的乡村、农民。文学中不会有纯然的“乡村真实”，一代一代的知识者依据自己的学识和情感构筑着自我乡村，对农民多少带有想象性质。那么农民的本质是什么？浩然笔下的农民形象提供了怎样的一种文学想象意义？在艺术与政治的纠结中，在新文学农民形象的长廊里，怎么衡量他们的价值？

浩然呈现的工农兵文学方向意义，是考察浩然的另一个重要视角。从现代文学开始，如何使文学“大众化”似乎是现代文学的努力重心。延安文艺讲话以后，“大众化”的对

象被限定在工农兵领域，并提出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但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知识分子写作始终和农民级别的阅读有差异，虽然赵树理的创作被文艺界推广为大众化的成果，但阅读赵树理仍然是有知识者的活动。而浩然和他的作品收到了农民能读、爱读的效果，《艳阳天》成为合作社之间相互赠送的礼物，这样的作家、作品、读者效应，不得不引人重视。提出浩然在大众化或者说在工农兵方向中的意义，研究浩然对这一文学方向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浩然是工农兵业余写作者出身，在从业余到专业作家的历程中，浩然的写作富有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相统一的独特性。换句话说，浩然是新中国历史主体中成长为作家的一员“大众”，他的创作是为新中国大众主体含义的农民服务的，书写的作品又是被“大众”接受，作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统一的作家，考察他的创作成就应当放入工农兵方向中。这样一位在工农兵方向有着独特意义的作家是不该被忽视的，他不仅是研究过往新文学工农兵方向的历史标本，也对当下底层写作有着启示意义，如今的“农民写”底层写作，虽然逐步得到关注，却完全不同于昔日浩然“农民写”的地位和待遇。从自豪、自信到心酸、自卑的农民写作变化，我们应该反思“工农兵文学”的含义，反思从提出农民是国家主人到如今农民依然处于社会底层的状态的此刻，浩然的文学意义何在？他那些自豪、激情的农民情怀，即使在当时具有乌托邦色彩，也是昂扬的、受人尊重的，而此时他讴歌过的那个时代的主人——农民人物精神，又具有什么启示？在普遍心酸的底层生存状态中，他笔下的农民理想主义情怀，对当前的实利社会有着怎样的启示？

上述种种，显示出浩然作为当代文学史上有研究价值的作家，努力说清楚，哪怕说清楚一点浩然的问题，对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凝汇着一种价值。

在浩然研究中，踏寻过往研究历程，重展记忆和史实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随着对十七年文学、“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关注，对浩然创作再评价成为一个重要环节。实际上，从浩然初登文坛到现在，对浩然及其作品的品评从未间断过。拂开这段历史的尘封，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遮蔽，文学史上对浩然的评论大致上可分作两种——肯定或否定。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毛泽东思想成为文学研究指导理论的期间，对浩然的评论大多以政治理念批评为主，通常在介绍浩然创作基本情况后分析其创作的意义。这期间对浩然的短篇小说较有文艺批评水准的两篇文章是叶圣陶的《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和巴人的《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较早指出浩然初期短篇小说的创作特点。叶圣陶欣喜地称赞道：“作者写对话、写景物，集中在表现人物的需要上，不肯随便浪费笔墨。所用语言朴素、干净，有自然之美。是可以上口念的作品，念起来比仅仅用眼睛看更有意思。”^①巴人从整体上给出评价：“《喜鹊登枝》里这十一篇小说，每篇都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读了以后，好像自己也下了一次乡，置身于新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个精神饱满、积极、勇敢而又活泼的青年男女，也看到了一些笑逐颜开、正直、纯良，从旧生活和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年老的一代。”^②此外，艾克恩的《人民公社的颂歌——评浩然的几篇短篇小说》、《说长道短——评浩然的短篇小说集〈苹果要熟了〉》、徐文斗的《谈浩然的短篇小说》

① 叶圣陶《新农村的新面貌——读〈喜鹊登枝〉》，《读书》1958年第14期。

② 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它》，《人民文学》1959年第11期。

等也对作品的主题、价值、创作特点等进行了分析。

《艳阳天》出版后，评论文章主要从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上分析，比如范之麟的《试谈〈艳阳天〉的思想艺术特色》、王主玉的《评长篇小说〈艳阳天〉》等文章。此时的文艺界已开始用阶级话语展开文学批评。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对浩然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阶级话语进行的。金梅、吴泰昌发表的《打着火把的领头人——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话教材——小说〈艳阳天〉读后》、《路线斗争的生动教材——喜读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等评论文，所操持的都是政治话语，用一些政治原理来代替文艺批评，直接引用马列、毛泽东语录比附作品，用庸俗阶级对立观片面剥离作品，造成作品评论公式化，远离真正的文学批评。同期，台湾旅加学者嘉陵发表于香港的长篇研究专著《我看〈艳阳天〉》，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唯一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1978年新时期开始，学术研究逐渐恢复正常化，由于对极左年代政治化的反思，对浩然的否定性评价开始多于肯定性。首先在基本肯定他新时期诸多创作的同时，对他“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创作进行了否定，比如对1978年后创作的《苍生》予以极大肯定，但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金光大道》、《白花川》、《西沙儿女》则完全否定；或者对具体作品给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如《艳阳天》。但是在具体的批评中，批评者难免把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批评者自己的感情色彩混同在一起，尤其针对浩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历，不断纠缠在政治意识形态批评话语中。这时期对浩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处于相对“冷清”的状态，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有雷达的《旧轨与新机的缠结——从〈苍生〉反观浩然的创作道路》、周德生的《浩然图式——对浩然小说创作演变轨迹的描述与评析》、金梅的《浩然十年创作描述》、侯健的

《泥土之歌——浩然的创作道路》等文章。这一时期政治批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学理性的研究意识逐渐增加，许多批评者已不仅仅限于或者满足于对单独作品的分析，而是力图对浩然的整体创作特征进行分析，如周德生的《浩然图式——对浩然小说创作演变轨迹的描述和评析》、金梅的《浩然十年创作描述》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针对浩然及其作品曾引发过三次较大的争议。第一次集中在1994年，以出版完整的四卷本《金光大道》为导火线，引起学术界众声争议。首先站出来发出肯定声音的是张德祥。张德祥在为《金光大道》再版所作的序言《作为小说的〈金光大道〉》里肯定了作品的价值。否定的意见则如杨扬《痴迷与失误》从艺术家的思想观点决定作品的真实性出发，否认作品有真实性；陈思和《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在做出学理化的分析后，认为作品虽然没有正面写“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现实，却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对《金光大道》进行了否定。第二次较大争议集中在1998年，以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引发争议。浩然发表了这样三个观点：“1、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从一个只读过3年小学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

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① 这一次争论引发的范围更广，争论的程度更激烈。部分理论家情绪激动，言论过激，言词有超出学术研究之嫌，甚至对浩然的人品进行攻击。如焦国标首先在1998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杂志发表了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紧接着，袁良骏在1999年9月10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浩然所谓的“贡献”》，草明在《今晚报》上发表了杂文《浩然的确是个“奇迹”》等，都对浩然及其作品进行了批评，充斥着很强的情绪化色彩，纷纷斥责浩然对自己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此同时，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张德祥等则为浩然及其作品辩护，从政治上和艺术上肯定浩然。当然也出现有学术价值的评论，如李云雷的《一个人的“金光大道”——关于浩然研究的几个问题》、孙达佑的《浩然创作心态》、王尧的《“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杨新强的《浩然小说，真实的虚幻》、张雅秋的《论浩然的小说创作》、段怀清的《论浩然六十年代初期的短篇小说写作》等文章，逐渐从对他个人的评价拓展为对50年来的中国文学进行梳理和评价，从而深化了浩然研究的意义，使这场本来充满了非理性因素的争论具有了逐渐深入的价值。第三次大的争论发生在2008年浩然逝世以后，不少学者针对浩然作品进行回顾性评价，不论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的学者均对浩然的人品给出正面评价，但对如何评价其作品仍有较大争议，随着对“十七年文学”、“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关注，说清楚浩然现象成为研究这段文学史的学者不可绕开的话题，也期待出现真正客观评说浩然的研究成果。另外，随着90年代研究界对史料实证的重视，陈徒手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郑实的《浩然口述自传》，通过搜集和采访

① 卢新宁 胡锡进《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环球时报》1998年9月20日。